

目录

总主编的话	i
前言	vi
第一章 中国译学话语研究的时代背景	1
<hr/>	
1.1 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	1
1.1.1 统计和分析	2
1.1.2 数据库验证	3
1.2 翻译研究的主流国家	5
1.2.1 英国	5
1.2.2 西班牙	7
1.2.3 美国	8
1.2.4 加拿大	9
1.3 翻译研究的先进国家	10
1.3.1 比利时	10
1.3.2 奥地利	11
1.3.3 德国	12
1.3.4 以色列	12
1.3.5 芬兰	13
1.3.6 其他国家	13
1.4 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	14
1.4.1 走向国际	14
1.4.2 渐入主流	15
1.4.3 自主创新	15
1.4.4 存在的问题	16
1.5 小结	19

第二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研究概述 21

2.1	基本概念·····	21
2.1.1	范畴·····	22
2.1.2	概念·····	23
2.1.3	术语·····	24
2.2	中国译学话语的历史分期·····	24
2.2.1	前学科阶段·····	25
2.2.2	准学科阶段·····	26
2.2.3	学科建构阶段·····	30
2.3	中国译学话语的发展路线·····	30
2.3.1	由中国传统文论生发·····	31
2.3.2	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	31
2.3.3	从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32
2.3.4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33
2.4	中国译学话语的建设途径·····	34
2.4.1	挖掘传统术语·····	34
2.4.2	提炼现代概念·····	36
2.4.3	借鉴国外范畴·····	36
2.4.4	完善已有表述·····	37
2.5	小结·····	39

第三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概念框架 41

3.1	译学的“一体三环”·····	41
3.1.1	何谓“一体三环”·····	42
3.1.2	以时间为经·····	44
3.1.3	以关联学科为纬·····	45
3.1.4	以“一分为三”为方法论·····	45
3.2	译学本体·····	46
3.2.1	本体的形成·····	46
3.2.2	本体的发展·····	47

3.3	内环：语言学	47
3.3.1	语言学的翻译研究	48
3.3.2	语言学对译学的意义	50
3.3.3	语言学术语融入译学本体	50
3.4	中环：关联学科	51
3.4.1	中环的形成	51
3.4.2	中环的作用	52
3.4.3	中环的意义	52
3.5	外环：文化与技术	55
3.5.1	文化学派	55
3.5.2	文化转向	56
3.5.3	翻译技术	57
3.6	小结	58
第四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范畴体系		59
4.1	佛经翻译时期译学话语的基本范畴	60
4.1.1	翻、译/翻译	62
4.1.2	本/经	63
4.1.3	文/质	64
4.1.4	中和/和合	64
4.1.5	言/语	65
4.1.6	口授(译)/笔受	66
4.1.7	格义	66
4.2	近现代译学话语的基本范畴	67
4.2.1	信达雅	68
4.2.2	神似/化境	68
4.2.3	直译/意译	69
4.2.4	归化/西化(洋化、欧化)	70
4.2.5	翻译标准	71
4.2.6	翻译批评	71
4.2.7	翻译方法、翻译技巧	72

4.3	当代译学话语的基本范畴	73
4.3.1	翻译教学	74
4.3.2	变译	74
4.3.3	应用翻译	75
4.3.4	翻译策略	75
4.3.5	翻译规范	76
4.3.6	跨学科翻译研究	77
4.3.7	翻译技术	77
4.4	译学范畴的传承与嬗变	78
4.4.1	古代译学范畴的传承	78
4.4.2	传统译学范畴的嬗变	79
4.5	小结	82
第五章 中国译学术语的创新与发展		83
5.1	术语的特征	84
5.1.1	科学性	84
5.1.2	专业性	84
5.1.3	单义性	85
5.1.4	其他	86
5.2	不同时期的译学术语	87
5.2.1	译学术语的萌芽期	87
5.2.2	译学术语的发展期	88
5.2.3	译学术语体系的创建期	91
5.3	译学术语发展的途径	93
5.3.1	赓续传统	93
5.3.2	创新术语	95
5.3.3	借鉴外论	96
5.3.4	融合翻译技术术语	98
5.3.5	借用关联学科术语	99
5.4	外来术语	100

5.4.1	外来术语的翻译	101
5.4.2	外来术语的定名	103
5.4.3	外来术语的本土化	105
第六章 译学话语的跨学科研究：转向、途径与模式		109
6.1	概念	109
6.1.1	双学科研究	110
6.1.2	多学科研究	111
6.1.3	超学科研究	111
6.2	转向	112
6.2.1	多重转向	112
6.2.2	语言学转向	113
6.2.3	文化转向	114
6.2.4	生态转向	115
6.2.5	社会学转向	116
6.2.6	技术转向	117
6.2.7	认知转向	117
6.3	途径	119
6.3.1	文艺学途径	119
6.3.2	文化途径	119
6.3.3	生态学途径	120
6.3.4	交际学途径	120
6.3.5	语言学途径	121
6.3.6	后语言学途径	122
6.3.7	社会符号学途径	123
6.4	跨学科研究的模式	124
6.4.1	找到汇合点	124
6.4.2	借用理论	125
6.4.3	借用方法	125
6.4.4	借用理论与方法	126

第七章 中国译学话语的跨学科研究：创新与问题 128

7.1	译学话语中的翻译学·····	128
7.1.1	73种翻译学鸟瞰·····	129
7.1.2	数据分析·····	131
7.1.3	理论源头·····	132
7.1.4	对“学”的认识·····	133
7.2	译学研究的类型·····	134
7.2.1	形而上的研究·····	135
7.2.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135
7.2.3	外围学科的横向研究·····	136
7.2.4	传统译论的系统研究·····	136
7.3	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	137
7.3.1	跨学科的广度·····	137
7.3.2	跨学科的深度·····	138
7.4	创新之路·····	139
7.4.1	自创新论·····	139
7.4.2	传承与发扬·····	140
7.4.3	“引进+本土化”·····	141
7.5	存在的问题·····	142
7.5.1	翻译学的盲目细分·····	143
7.5.2	强征其他学科概念·····	144
7.5.3	传统译论的转换之难·····	144

第八章 关联学科对中国译学话语的贡献 146

8.1	跨学科的三个交叉中枢·····	146
8.1.1	语言转换与加工·····	148
8.1.2	哲学思维与伦理·····	150
8.1.3	社会文化与规范·····	153
8.2	语言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156
8.2.1	语际转换过程·····	157

8.2.2	转换过程中话语信息的传递	159
8.2.3	语言单位在话语转换中的对应关系	161
8.3	生态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161
8.3.1	语境与译境	162
8.3.2	翻译生态	164
8.3.3	翻译环境	165
8.3.4	翻译生态环境	168
8.4	文体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170
8.4.1	翻译的得体	170
8.4.2	词句的得体	172
8.4.3	篇章的适切	174
8.4.4	文体的相应	175
8.5	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	176
8.5.1	翻译的社会性	176
8.5.2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	177
8.5.3	卡隆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180
8.5.4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181
参考文献		183

总主编的话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多次翻译高潮：从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可以说这一次次翻译高潮构筑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座高峰，承载了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使命。两千年“翻译世界”的活动不仅引发了相互交织、绵延至今的中外文化交流实践，更是给中国带来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同时，自古洎今，“翻译中国”的实践也并非付之阙如，很长时间以来，虽不及“翻译世界”主旋律般的华彩乐章，却也华音袅袅，弦歌不辍，并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变。从唐代高僧玄奘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递东方智慧，到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将儒家经典译至拉丁文，架起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从清末民初译界逆行者辜鸿铭通过译写将中国文化精髓传扬至西方，至1949—1979年间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的有组织多语外译¹，“翻译中国”华音渐强，且内涵不断丰富。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翻译的新时代，随着国家层面规划的“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对外翻译出版工程的启动，特别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在“翻译世界”依旧充满活力的同时，“翻译中国”已成大势，肩负起让世界理解中国的重任。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和世界格局的日益变化，以及

1 孙宁，2022，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对外译介的百年历程，《百年潮》，（3）：62-68。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翻译中国”迎来新的契机。中国的文学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经验和治理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大量对外译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独特魅力与智慧。这一发展不仅标志着中国正从“翻译世界”走向“翻译中国”的新纪元，更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

“翻译中国”极大促进了中国故事、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接受，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对全球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翻译中国”绝非易事，中国故事和中国思想蕴含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需要通过恰当的话语内容、方式和渠道走向世界。正如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翻译界的任务不仅是通过“翻译中国”向世界介绍中国，更要致力于塑造一个客观、清晰、丰满、积极的中国形象。这就亟需外语和翻译界下大力气，在“翻译中国”的同时，对中华文化的外译历史、外译类别、译介规律、经验模式、受众心理、传播效能等情况展开调研，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方式，并对其中伏脉千里并延展至今的翻译思想进行凝练、发展与创新。

在此背景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特别策划了“‘翻译中国’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旨在深入探讨“翻译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对新时代“翻译中国”事业和国际传播战略的积极回应。丛书分为文学翻译、文化翻译、话语翻译和译学探索四个子系列，每个子系列由数量不等的单册专著组成。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套丛书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多元且前沿的研究选题。 每个子系列均紧扣“翻译中国”主题展开，通过收录该系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对每一系列开展脉络梳理、经验总结、问题分析与前景展望。具体来说，文学翻译子系列既涉及宏观或中观层面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戏剧、网络文学、武侠文学、科幻文学、诗词、文论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也包含《沧浪诗话》等微观个案作品在特定国家的阐释、传播与接受，旨在分析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海外译介模式与国际传播路径，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视角和策略。文化翻译子系列广泛覆盖中国民俗文化、少数民族典籍、

影视作品、中医药文化、武术文化、饮食文化、美术文化、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译介与传播研究，致力于探索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播至世界不同角落的有效途径。话语翻译子系列包括中国时政话语、哲学话语、外交话语和中央文献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力图探索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话语传播的有效方式，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路径和发展理念的理解与认同。译学探索子系列则意图展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丰硕成果。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到应用翻译学探索，从知识翻译学的构建到中国翻译话语的系统建设，这些创新性成果不仅为当代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译学话语的原创性贡献。

其二，连贯而严密的逻辑架构。我们精心策划的文学翻译、文化翻译、话语翻译以及译学探索四个子系列，在“翻译中国”的实践中各具要义，它们既可独立成册，又相互关联，内容上互补，实践上互促，理论上互涉，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不同角度回应新时代“翻译中国”实践与研究的迫切需求。具体而言，文学翻译子系列旨在以翻译为媒介，探讨如何将中国气韵生动、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推向世界，以润物无声、绵长悠远的方式让国际受众感知中国的人、事、思；文化翻译子系列进一步探讨如何将文学或其他类型作品中蕴含的我国独特历史文化元素译介给异域民众，从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不同方面的体验与欣赏；话语翻译子系列聚焦中国各领域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达，探讨如何通过精准的话语翻译和有效的国际传播，引导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译学探索子系列则基于对文学、文化、话语等领域长期译介实践和传播规律的深入总结，升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体系，为中译外实践提供前瞻性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也为国际译学界带来中国学者守正创新的译学新论。四个子系列力求巧妙结合，共同构建一个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翻译中国”研究体系。

其三，深耕翻译与跨越学科的学术视野。丛书的专家学者既立足翻译学科，潜心梳理我国优秀文学文化以及各领域重要话语的译介全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译学理论话语，展现我国翻译学者的理论自信，又保持开阔的学术视野，跳出传统翻译研究聚焦语言转换和产品质量评价的

局囿，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考察对外翻译产品的译介效果和传播效能，认真研究国际受众的反馈评价，从中获取宝贵的建议与启示。在特色译学理论探索过程中，既扎根“翻译中国”的丰富实践，亦关注全球翻译理论的最新动态，并加以合理引进、吸收与融合，不仅为“翻译中国”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更能推动中国特色译学理论话语与国际前沿理念接轨，提升中国翻译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四，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统筹兼顾。我们在本套丛书的编撰与出版过程中，力求学理探讨和实践探索并重。学理层面，丛书通过全面收录“翻译中国”代表性实践与理论话语建构论著，意图呈现“翻译中国”研究的主要脉络和理论演进，为国内外译学界搭建一个全面展示和交流“翻译中国”研究成果的高端平台，推动“翻译中国”研究纵深发展。实践层面，丛书所凝练的各类对外翻译产品译介与传播规律，可为未来“翻译中国”实践与理论话语深入探索提供宝贵经验和启示，为“翻译中国”政策规划及实施提供翔实的案例参考与数据支持。

在丛书策划阶段，我们荣幸地邀请到来自国内不同高校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他们不仅在“翻译中国”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且勤于探索、善于沉思，共同组成了本套丛书的权威撰稿团队。他们或道术结合，发掘“翻译中国”成功案例背后的译介规律，或交叉跨越，将翻译学与传播学等学科结合，探究我国文学文化作品及话语在海外的传播效能，或融合出新，在中国传统译学话语和国际既有翻译理论基础上提出原创性译思，共同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成果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相信他们的成果不仅会为译学界提供宝贵的“翻译中国”研究文献，也会给广大读者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学术收获。

在“翻译世界”仍方兴未艾、“翻译中国”已如日方升的历史性时刻，有机会担任这套丛书的总主编，我们既深感荣幸，又自觉责任重大。尽管我们为丛书编撰付出了诸多努力，希望其不仅是“翻译中国”研究的知识宝库，更是中华璀璨文化与当代中国对外话语及译学理论成果的荟萃，但不可否认，这套丛书只是相关研究的冰山一角，还有许多领域和话题留待后续探索。我们的愿景是凝聚“翻译中国”学术共同体，建立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翻译中国”研究体系，推动相关实践和学思不断开疆拓土，纵深发展。基于此，我们希望丛书能够成为一个充满

活力，始终保有前沿性和引领性的学术阵地，不断吸纳“翻译中国”研究领域内的最新实践与理论成果，持续发挥其学术影响和实践价值，激发更多中外学者和青年学子对“翻译中国”的实践热情与研究兴趣，携手共促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在丛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众多同行专家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们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各位专家学者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们共同努力，遵循立足中国、关注国际，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实践和研究思路，以丛书为媒，以学思为介，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以“翻译中国”的微观阐述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宏大叙事。

许钧 王克非 任文

2024年1月22日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翻译思想和译学话语如潮水般纷至沓来。时值我等初创翻译学刊《上海科技翻译》（现名《上海翻译》），筚路蓝缕，开辟译学园地。作为主编，对于这个学科及其对象的了解和掌握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更是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笔者学习和研究译学话语的实践由此开始。

术语是专业领域概念的表征。学科的创新表现为术语的创新，创新的概念和话语常用新术语来表达。编辑学术期刊要求编者站位学科前沿，加上我对新知的渴望和追求，遂养成摘录、整理、识解新术语的习惯，三四十年来一直钟情于此。译学术语的收集整理、爬罗剔抉、钩考备证，成为日常。术语的甄别、积累、编译辑录，是建构译学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

译学话语是谈论或阐述翻译问题所说的话，属专业话语，其基础是译学思想。概念是思想的细胞，一切思想由概念组成，概念则通过语词表述而存在。译学话语由词语组成，特别是译学术语，看似零星散落，细品则垂条结繁，条理分明。话语是术语存在的空间，研究专业话语，必定关涉术语。在整理纷繁的译学术语的过程中，笔者依顺译学的历史纵向发展脉络和横向的跨学科联通，在译学概念和术语关联中初悟译学话语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勾勒出我国译学发展的“一体三环”图式（详见第三章），并以此作为译学概念系统的架构。

20世纪后期，我国学者穷尽性地搜索并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对西方话语的基本命题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讨论，涉及等值论、等效论、读者反应论、改写论、目的论、翻译操控论、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翻译论、后殖民主义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论、文化转向论、功能翻译理论、翻译诗学等，一时间外论连篇累牍，

域外之观纵横驰骋。只要粗略地检视一下当时的译学话语，就会发觉承载我国译学体系的基础概念工具主要来自西方。

新旧世纪之交，我国翻译研究完成了“与国际接轨”，大规模的理论引进告终。随之，学者们立足本土，创新理念，致力于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已被唤醒，建构符合中国实际且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学术表述的译学话语体系成为新的目标。21世纪的前二十年，涌现出以“xx 翻译学”或“翻译 xx 学”等命名的翻译理论就多达 70 余种。还有更多不贴“学”字标签，也属系统研究翻译之幽微曲细的理论，影响大者如黄忠廉的“变译理论”、笔者倡导的“应用翻译研究”和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译学话语。

近几年，笔者沉潜于 2011 年版《中国译学大辞典》的修订工作，重点关注反映 21 世纪初期我国译学研究的成果。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蔚然确立，用中国理论来解释中国翻译现象已成为日常。具有继承性、时代性、原创性、自主性的系统理论还在不断产生。倡导者们提出了一批新范畴、新概念，其核心术语已进入上述大辞典第二版的词目。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是构筑专业话语体系的基础。译学术语体系是译学理论结构的表现及传播形式。无独立的概念和术语体系，就无法塑造独立的话语体系。

译学话语见证了译学的成长，它纵横贯穿于翻译研究的进展中，忠实地记录了翻译研究进步的足迹，回应了曾经的热点、焦点和重点。笔者关注译学话语已有时日，但浸润于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阐释的时间不长。围绕“译学话语”主题，近年发表论文 11 篇，现犹仍纠缠于心，于是复取前稿，补苴罅漏，加以条贯，博综各家，次第展开，遂成拙作。以下是笔者所发有关论文的篇名、期/报刊名及其年号：

篇名	期/报刊名	年(号)
当今世界翻译研究的格局——兼论21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6 (3)

(待续)

(续表)

篇名	期/报刊名	年(号)
当今翻译研究的主要论题——四种国际译学期刊十年(2004—2014)考察	《外语与翻译》	2017 (3)
翻译大国需有自创的译学话语体系	《中国外语》	2017 (5)
建设中国译学话语：认知与方法	《上海翻译》	2019 (4)
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勃兴之路	《当代外语研究》	2021 (1)
拓展跨学科翻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5-10 (1)
译学术语中的同名异义	《外语与翻译》	2022 (2)
从术语创新看翻译研究的走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1)
跨学科创学之成败得失——66种跨学科的翻译学鸟瞰	《外国语》	2023 (2)
中国译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探源	《中国翻译》	2023 (3)
跨学科译学研究的三个交叉中枢	《上海翻译》	2024 (2)

本书概述国内外译学话语的研究及近况(第一、二章),论述译学话语的概念框架、范畴体系和术语体系(第三、四、五章),探析跨学科研究在当代中国译学话语建构中的特点、方法和作用(第六、七、八章)。目前,译学话语仍是翻译研究中需要深耕的一个领域,期待有更多题旨高远、备证细心、理明义精之作。千虑一得,深望读者批评指正。

方梦之
2023年4月

中国译学话语研究的时代背景¹

建构中国译学话语是我国过去 20 年的核心课题之一。在我国，现代翻译学的建立过程既有传承和发扬传统译论的一面，而更多的是像其他学科一样，又有引进、消化、融合、创新的一面。“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中国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不断碰撞和融合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以求实现传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历史。”（徐国利 2011：94）中国译学话语是一套与时代背景、文化基因、价值观念等要素密切关联的符号系统和叙事结构，其产生恰逢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百年未遇之大变局。

纵观当代国际翻译学科的发展，各国的翻译研究或进或退，或上或下，此起彼伏：有的后来居上，擢升前位；有的步履维艰，落在后面；也有的创新不断，一路领先。21 世纪以来，我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加强，建设译学话语的呼声日隆，学界以中国的现实和立场为出发点，积极寻求与西方对话，主要表现是在国际期刊上的发文量骤增，近年已超越西班牙，名列第一。现将有关数据及国内外概况综述如下。

1.1 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

为掌握世界翻译研究的格局及其动态变化，笔者曾对 1989 年至 2014 年间五

1 本章部分参考笔者《当今世界翻译研究的格局——兼论 21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一文（原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 年第 3 期）。

份国际期刊的论文发表与传播进行了逐期的统计分析，对其中部分论文做了重点研究，并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于2020年主导编写出版了《语言学国际学术期刊论文选：翻译研究》。在这五份国际期刊中，创刊最早的是1954年的翻译期刊 *Babel*，最晚的是2012年创刊的 *Translation Spaces*。*Babel* 发表了较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章，能较普遍反映国际译联各成员的学术成果。在统计年间，*Babel* 共发论文171篇，作者国别涉及36个国家，平均每个国家发文4.75篇。其中，尼日利亚高达11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7篇，约旦6篇。这些国家的作者在其他国际期刊上发文寥寥。*Target* 主要刊发欧洲国家作者的文章，我国学者在该期刊上的发文数量相对较少，只有香港特区的个别学者的文章被刊登。与之相比，我国学者在 *Perspectives* 和 *Babel* 上的发文数量相对较多。

1.1.1 统计和分析

下面是五份翻译学术期刊的简介及发文数量统计分析。

1.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以下简称 *Babel*)，创刊于1954年，是最早的翻译专业期刊，也是国际译联会刊。
2.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以下简称 *Target*)，由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于1989年创刊，其编委成员均为世界一流的翻译研究专家。
3.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以下简称 *Perspectives*)，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翻译及词典学研究所编辑，是国际主流翻译期刊之一。1996年第1期为中国专刊。
4.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创办于2006年，是美国口笔译研究协会会刊。
5. *Translation Spaces* 创刊于2012年，是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多学科、多媒体、多语种翻译学术刊物。

由表1.1可见，西班牙、中国、美国、英国的发文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四国的文章总数占表中国家发文总量的76.2%，可认为是国际翻译研究界的第一梯队。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的发文量居中。以色列、德国、法国等国的发文量近些年来止步不前。

表 1.1 2004/2005 年起的 10 余年间五刊的发文详情及排名 (前 10)

排序	国家	发文总数	占总发文628篇的%	<i>Babel</i> 2004-2013 年共171篇		<i>Target</i> 2005-2014 年共103篇		<i>Perspectives</i> 2005-2014年 共192篇		<i>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i> 2006-2014年 共139篇		<i>Translation Spaces</i> 2012-2014 年共23篇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发文	占比
1	西班牙	106.5	17.0%	50	29.3%	20.5	19.9%	43	22.4%	4	2.9%	5	21.7%
2	中国	96.25	15.3%	47.5	27.8%	5	4.9%	54	28.1%	2.75	2.0%	2	8.7%
3	美国	81.33	13.0%	12	7%	3.5	3.4%	10.83	5.6%	40	28.8%	3	13.0%
4	英国	63	10.0%	16	9.4%	22.5	21.8%	18.5	9.6%	11	7.9%	0	0
5	加拿大	28	4.5%	10	5.8%	9	8.7%	6	3.1%	5	3.6%	2	8.7%
6	比利时	27	4.3%	7	4.1%	11	10.7%	3	1.6%	8	5.8%	1	4.3%
7	澳大利亚	18.3	2.9%	3	1.8%	5	4.9%	3.3	1.7%	6	4.3%	2	8.7%
8	以色列	15	2.4%	3	1.8%	8	7.8%	2	1.0%	7	5.0%	0	0
9	德国	10.16	1.6%	0	0	6.5	6.3%	2.66	1.4%	1	0.7%	0	0
10	法国	10	1.6%	0	0	8	7.8%	1	0.5%	1	0.7%	0	0

各国的发文数与期刊的主办机构、研究取向等有关。例如,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是美国口笔译研究协会会刊, 在美国编辑, 荷兰出版, 创刊后的前两年 (2006—2007) 发表美国作者论文 19 篇, 占比为 70.4%。其中, 论文作者尤以来自联合主编布莱恩·詹姆斯·贝尔 (Brian James Baer) 所在的肯特州立大学的师生为多。

1.1.2 数据库验证

为了验证以上统计结果, 弥补来源期刊的不足和缩短距今的出刊年份, 下面引用王立松、张旭姣 (2022) 检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14 种 SSCI 和

A&HCI 来源期刊的统计结果（见表 1.2）加以验证，该研究的检索时间跨度为 2005 年至 2021 年。

表 1.2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14 种翻译学来源期刊中国学者的发文情况（2005—2021）

序号	期刊名称	出版国家	刊期	收录情况	论文总数	中国学者发文量	中国学者发文量占比	国际排名
1	<i>The Translator</i>	英国	季刊	SSCI; A&HCI	531	39	7.34%	3
2	<i>Translation Studies</i>	英国	四月刊	SSCI; A&HCI	516	24	4.65%	5
3	<i>Target</i>	荷兰	季刊	SSCI; A&HCI	475	47	9.89%	3
4	<i>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i>	英国	四月刊	A&HCI	419	6	1.43%	7
5	<i>Babel</i>	荷兰	双月刊	SSCI; A&HCI	484	146	30.17%	1
6	<i>Perspectives</i>	丹麦	双月刊	SSCI; A&HCI	425	110	25.88%	1
7	<i>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i>	英国	季刊	SSCI; A&HCI	383	49	12.79%	3
8	<i>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i>	荷兰	四月刊	SSCI; A&HCI	262	31	11.83%	2
9	<i>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i>	匈牙利	半年刊	SSCI; A&HCI	234	31	13.25%	2
10	<i>Interpreting</i>	美国	半年刊	SSCI; A&HCI	240	34	14.17%	1
11	<i>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i>	英国	半年刊	SSCI; A&HCI	238	24	10.08%	3
12	<i>Translation Review</i>	美国	四月刊	A&HCI	223	20	8.97%	2
13	<i>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ew Series</i>	比利时	年刊	SSCI; A&HCI	208	18	8.65%	3
14	<i>Meta</i>	加拿大	季刊	A&HCI	388	27	6.96%	4

表 1.3 发文量前十国家/地区的论文总数及被引频次(2005—2021)

序号	国家	发文量/篇	总被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 (去除自引)	篇均被引频次	h指数
1	英格兰	665	2,487	2,259	3.74	25
2	中国	606	1,068	782	1.76	12
3	西班牙	548	1,891	1,662	3.45	18
4	美国	500	1,166	1,087	2.33	16
5	加拿大	274	642	604	2.34	11
6	比利时	238	970	883	4.08	16
7	意大利	189	577	540	3.05	14
8	澳大利亚	179	736	680	4.11	14
9	苏格兰	174	360	338	2.07	10
10	法国	142	275	265	1.94	9

数据来源的扩大和统计时间的靠近,使得结果更接近现状。对照表 1.1 和表 1.3 的前十名单,可以发现,居前者大致相符。

1.2 翻译研究的主流国家

翻译研究的主流国家是指在翻译研究方面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其特征为系统的翻译研究开展得较早、有著名学者引领、有完善的翻译教育体制、国际发文量名列前茅且引用率较高。这里指英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等四国。

1.2.1 英国

英国具有深厚的人文学术土壤和根基,其翻译研究渊源深远、传统深厚,名

家云集、新人辈出，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一路领先。二战后，翻译研究蓬勃兴起，翻译中的语言现象成为新的研究对象，翻译的语言学派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社会语境学派的创始人 J. R. 弗斯 (J. R. Firth)，他开启了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此后，约翰·卡特福德 (John Catford)、彼得·纽马克 (Peter Newmark) 等加入，逐渐奠定了英国作为世界语言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地位。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65) 中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翻译理论。卡特福德在该书中借用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的系统语法及其对语言层次的分类来说明翻译转换现象，将翻译分为完全翻译 (total translation) 和受限翻译 (restricted translation)，并分别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和处理。纽马克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在许多翻译理论问题上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特别是以其代表作《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 所提出的“语义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和“交际翻译”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著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阶段，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乔治·斯坦纳 (George Steiner) 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75) 运用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文化史学的理论来解释语言，被评价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谭载喜 (2009a: 217) 认为，“(斯坦纳的) 一个核心观点是：‘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实际上乃是一个翻译过程。翻译是语言的基本因素。在最基本的思想交流中，翻译是内隐的；在人类数千种不同语言的共存与相互接触中，翻译则是一项外显活动’”。巴兹尔·哈蒂姆 (Basil Hatim) 是最早把话语分析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其主要译学论著包括与伊恩·梅森 (Ian Mason) 合著的《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1990) 以及《作为交际者的译者》(*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1997)。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文化转向”的号角在英国华威大学吹响。作为文化翻译学派旗手的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于 1990 年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一书序言中描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这一由玛丽·斯内尔-霍恩比 (Mary Snell-Hornby) 首先提出的“文化转向”

话语在翻译研究领域普泛化，引领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之维。90年代中期，注入当代科技成果的翻译研究新范式——语料库翻译研究起步。*The Translator* 的主编莫娜·贝克 (Mona Baker) 及其团队于1995年在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创大规模可比语料库——翻译英语语料库 (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 简称 TEC) ——并创立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开辟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翻译研究途径。

进入21世纪, 英国学者又引领多学科、多媒体、多视角的翻译研究, 召开了多次国际翻译学术会议。2001年7月, 巴斯内特在华威大学召开以“翻译与协调”(translation and mediation) 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大众传媒、广告学、文学、艺术史等多学科领域, 在新的语境下进一步拓宽了译学研究的途径。同年, 曾任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主席的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 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主题为“翻译的跨文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作为他承担的重大项目“东西方的翻译与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该项目借用符号学、阐释学、翻译理论史、比较文学及描写翻译学的理论分析, 研究东西方翻译理论的跨界对话。此外, 安德鲁·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按国籍是英国人, 长期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任教, 对翻译理论多有贡献 (详见1.3.5)。除了上述名家外, 杰里米·芒迪 (Jeremy Munday)、马克·沙特尔沃思 (Mark Shuttleworth) 以及何塞·迪亚兹-幸塔斯 (Jorge Díaz-Cintas) 等学者在新世纪也多有成果问世。

英国学者在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中引领学科进步, 开译学范式创新之先, 成就卓著。

1.2.2 西班牙

从表1.1和表1.3可见, 近二十年来西班牙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国际发文量一直名列前茅, 在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特别是在视听翻译研究和本地化研究方面成就显赫。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PACTE (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 小组的多项研究成果为国际译界广为认可和引用。该小组于1997年成立, 一直致力于译者翻译能力的研究,

通过对职业译者及翻译教师具体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建构了翻译能力构成模型以及翻译习得模式。该研究小组（PACTE 2005）指出，翻译能力并非单纯的双语转换能力，而是由六种子能力构成：双语子能力、语言外子能力、策略子能力、工具子能力、翻译知识子能力、心理-生理要素。“值得注意的是，PACTE模型已经被迅速运用到职业译者训练，其中以2005年正式启动的‘欧盟笔译硕士’（EMT）项目最具影响力。……目前已有来自16个欧盟成员国的34所高校正式开办。”（王传英2012：35）

西班牙有完备的翻译教育体系。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班牙多所学校就办有翻译学刊，主要讨论语言和翻译教学，也涉及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后来，巴塞罗那大学的翻译与跨文化小组于2006年创办的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网络半年刊 *Transfer* 影响最大。

罗维拉-威尔吉利大学的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是西班牙译界的代表人物，曾任国际译联主席，著述颇丰。其著作《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1998）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翻译，凸显翻译与社会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本翻译史研究的世界名著。他在其中提出的关于翻译能力的最简方案（minimalist approach）在欧洲颇有影响。他也是翻译与当代科技相结合的研究者和创导者，在其编著的《移动的文本：本地化、翻译和发布》（*The Moving Text: Localization, Translation, and Distribution*, 2004）中提出本地化文本是不断地被翻译和发布的移动文本。皮姆也是 *Translation Spaces* 和 *Target* 等多种国际期刊的顾问或编委。

1.2.3 美国

与英国、中国、西班牙相比，美国的发文量略占下风。图里生前对美国学者在 *Target* 中的边缘化并不感到惊讶。对此，他有两点解释：“一、奈达之后，美国翻译研究界总体被边缘化，这与其对 *Target* 在‘意识形态’平台上讨论这门学科的认识有关；二、*Target* 和这门学科的许多内容长期受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Toury 2009：197）图里同时指出，这跟美国2006年创办的学术期刊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不无关系。美国的81篇论文中有40篇发表于此。这份美

国口笔译研究协会会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会员的学术利益。

实际上，美国的翻译研究队伍阵容强大，拥有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玛丽亚·提莫志克（Maria Tymozko）、赫伯特·C. 托尔曼（Herbert C. Tolman）、道格勒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一批世界译坛翘楚，他们在传统研究方面并不显眼，但在翻译的文化研究、翻译技术研究以及与新兴学科结合等方面走在前列。

除了2006年创办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之外，2012年美国又创办了 *Translation Spaces*，由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格雷戈里·什里夫（Gregory M. Shreve）和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黛博拉·福拉隆（Deborah Folaron）联合主编。这是一份多媒体、多学科、多语言相结合的杂志，它把人们对翻译的视界引向更广阔的领域。该刊代表了当今翻译研究的前沿，认为翻译具有全球性和跨学科性，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复合系统，人们从中共享知识、信念和价值。该刊积极鼓励研究者从不同领域，如通信论、信息技术、经济、商业、法律、管理、科学、新闻、娱乐等不同视角切入翻译研究（Folaron & Shreve 2012）。

美国是本地化需求最大的市场，在翻译技术方面领先，本地化研究活跃。根据崔启亮（2015：71）的研究，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论述本地化的著作《本地化实用指南》（*A Practical Guide to Localization*）是莱博智公司（Lionbridge）副总裁伯特·埃斯林（Bert Esselink）于2000年所著。2004年，海瑟·麦克斯韦·钱德勒（Heather Maxwell Chandler）系统阐述游戏本地化的专著《游戏本地化手册》（*The Game Localization Handbook*）问世，把翻译拓展到了娱乐业。

1.2.4 加拿大

加拿大在表 1.3 中名列第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是加拿大最具特色的一个领域，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和路易斯·冯·弗洛图（Luise von Flotow）。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其背后的权威机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妇女进入文学世界的途径。西蒙和保罗·圣皮埃

尔 (Paul St-Pierre) 合编的《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00) 挑战广为接受的后殖民理论, 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学、文化理论, 探讨了在马来西亚、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和南美等地区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当代西方相关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

翻译史研究也是加拿大的强项。其代表人物让·德利尔 (Jean Delisle) 曾任国际译联翻译史委员会主席, 在拓展翻译史研究领域, 特别是译者及其译作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 以及翻译史学家对翻译评估的可行性研究手段等方面均有贡献。长期以来, 口译史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领域。目前, 朱迪斯·伍兹沃思 (Judith Woodsworth) 正在带领她的团队研究口译史。她认为, 口译活动稍纵即逝的特点决定了研究的难度。

安妮·布里塞特 (Annie Brisset) 是国际翻译与跨文化研究协会的创始人、加拿大翻译协会前主席, 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项目顾问。她的专著《翻译的社会学批评：魁北克的戏剧与异域性 (1968—1988)》(*A Socio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atre and Alterity in Quebec, 1968–1988*, 1996) 最早从社会学视角探讨翻译现象。

1.3 翻译研究的先进国家

翻译研究先进国家是指学术影响力次于主流国家, 但在国际译学研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 有的在以往的研究中表现突出。以下介绍比利时、奥地利、德国、以色列、芬兰等国。

1.3.1 比利时

比利时在表 1.3 中名列第六。比利时是一个多语国家, 其首都布鲁塞尔也是欧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其官方语言为荷兰语 (主要在北方地区使用)、法语 (主要在南方地区使用) 和德语 (主要在东部边界地区使用)。比利时国内有多所翻译学院。其中, 安特卫普大学的翻译学院是欧洲委员会等国际机构招聘工作人员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名誉院长弗兰克·皮特斯 (Frank Peeters) 以音视频翻译闻名,

担任国际口笔译高等教育机构常设会议组织 (CIUTI)¹ 主席。

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 (20 世纪 80 年代移居美国) 是文化学派的旗手之一, 由他提出的学科名称 “Translation Studies” 被广为接受。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的若泽·朗贝尔 (José Lambert) 长期从事描写性翻译研究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是翻译文化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历史-描写研究方法及微观实证研究对巴斯奈特² 和勒菲弗尔有较大影响” (杨建华 2009: 382)。在图里之后, 朗贝尔是 *Target* 现任的两位主编之一, 另一位译界巨擘勒内·哈瑟琳 (René Haeseryn) 曾长期担任 *Babel* 的主编。

1.3.2 奥地利

奥地利是欧洲内陆国家, 与多国接壤。1976 年, 联合国决议将维也纳设为纽约、日内瓦之外的第三会议中心, 一批联合国下属机构和国际组织设立于维也纳。此后, 翻译成为该国的重要产业, 格拉茨大学、维也纳大学、因斯布鲁克大学等院校都设有口笔译学院。它们都是国际口笔译高等教育机构常设会议组织 (CIUTI) 成员。奥地利重视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翻译, 加速建构翻译社会学。2005 年 5 月, 格拉茨大学举办了题为 “作为社会实践的口笔译”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的国际会议, 旨在推动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同年末, *The Translator* 出专刊讨论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社会学理论及其翻译社会学。2007 年, 由格拉茨大学翻译系的米凯拉·沃尔夫 (Michaela Wolf) 和亚历山德拉·夫卡利 (Alexandra Fukari) 主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一书由本雅明出版公司出版。对此, 有人称之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social turn)。

维也纳大学的斯内尔-霍恩比是西方翻译研究学派或翻译文化学派在德语

1 CIUTI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ermanente d'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ètes) 成立于 1961 年, 常被译为 “国际翻译学院联盟”, 是国际权威教育认证组织, 致力于保障高质量的职业口笔译工作,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口笔译理论研究和人员培训。目前, 我国已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大学等五所高校成为 CIUTI 的正式成员。

2 即巴斯奈特。

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是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和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的弟子，欧洲翻译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她特别强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收录于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文化途径”（cultural oriented approach）这一概念。

1.3.3 德国

德国是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发源地。代表人物有莱斯、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Mänttari）和克里斯汀·诺德（Christiane Nord）。莱斯提出的文本类型（text typology）理论，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奠定了基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至今在翻译界仍有影响，其第一代代表人物如莱斯、弗米尔等已销声匿迹。人数不多，但曾在教学和科研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第二代（如诺德等）正在隐退。人们自然把振兴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即往届代表人物的学生身上，但事与愿违。诺德说：“这是因为德国学术界的情况特殊（此处不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训练有素的口笔译者成为出色的从业人员后，优异的工作表现带来丰厚的报酬，使其再无任何返回学术圈的意愿。甚至有些在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研究人员也离开大学去谋求高薪岗位。”（Nord 2012: 31）俱往矣，曾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大本营的德国后继乏人，就连硕果仅存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诺德近几年也远涉重洋，到南非、中国等地执教，对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不显。

1.3.4 以色列

以色列是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的诞生地，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该理论的创始人。他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多元系统论，目的不单是要改善文学研究的方法，还要修订文学的概念，也就是修订研究对象本身（Even-Zohar 1978: 7）。埃文-佐哈尔从多元系统论出发，探讨译作和文学大类（涵盖从诗歌、韵文到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之间的关系，阐明译入语文化既决定某作品是否需要翻译，又规范遣词造句，并主张，“翻译属

多元体系的第二体系，作用取决于译入语文化及其文学的强弱和发展阶段。认为，译作无固定身份，因其社会、文学和历史背景，而具有多种特性（multiple identities）”（赵家璿 1996：47）。图里是 *Target* 的创刊人，并从 1989 年担任主编至 2008 年，长达 20 年。该刊对当代译学研究，特别对文化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图里沿着詹姆斯·S·霍姆斯（James S. Holmes）开创的翻译研究学派的基本路线，做了大量的翻译描述和理论建设工作，被视为文化和操纵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2009 年起，图里不再担任 *Target* 的主编。由于以色列国内学界后继无人，该刊主编由学术倾向相同的比利时人朗贝尔和英国人科斯腾·马尔姆克亚尔（Kirsten Malmkjaer）接任。

1.3.5 芬兰

芬兰的翻译研究起步早。早在 1955 年，芬兰口笔译协会就成立了，并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口笔译专门教学。1981 年起，赫尔辛基大学等开始设立翻译系或翻译学院，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大推动了翻译学术研究。芬兰学者的论文主要在 20 世纪末发表在 *Target* 上。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切斯特曼是芬兰翻译学术界的代表人物，目前仍活跃在世界译坛。切斯特曼著述颇丰，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包括：（1）发展了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2）创立了翻译模因论，把模因作为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单位；（3）阐释了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和翻译方法论。另一位世界著名的芬兰籍德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为赫兹-曼塔利，是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其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涵盖所有的跨文化转换形式。她对“翻译”和“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进行了区分，认为翻译行为是指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信息传递过程，而翻译只是一种文本形式上的跨文化转换活动，翻译是翻译行为的具体操作（Holz-Mänttari 1984）。

1.3.6 其他国家

法国、荷兰、丹麦、挪威等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翻译研究中都有一段繁荣史，多有英才活跃在世界译坛，至今仍有挪威的维尔纳·科勒（Werner Koller）、丹麦的凯伊·道勒拉普（Cay Dollerup）等著名学者享誉世界。著名译学期刊

Perspectives 创办于丹麦，成为译界的前沿阵地。但总体而言，其光景不再。比较表 1.1 和表 1.3 可以发现，表 1.1 末尾的以色列、德国在表 1.3 并未上榜，而法国在表 1.3 中也仅位列第 10。这是因为 21 世纪以来，此三国的翻译研究人才青黄不接，翻译研究式微，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盛况形成很大的反差。表 1.3 中的意大利出现在第 7 位，确有缘由。在欧洲，意大利是一个翻译大国，在其一年出版的 2 万部书籍中，翻译作品占三分之一，主要为文艺作品。意大利翻译研究也有传统，诗人、翻译家既受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诗歌不可译性”理论的影响，采用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又在理论上绕开“不可译”的传统论点，走向“译入语中心”。意大利等国，仍有潜势，其翻译研究发展繁荣或指日可待。

1.4 中国翻译研究的崛起

翻译学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新兴学科，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带有西方色彩。“与国际接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译学研究的内需动力，也是我国用较短的时间就赶上了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一时间内，期刊以介绍或阐述国外译论为主基调，“食人主义”“符号暴力”“翻译暴力”“翻译的窘境”等令人疑窦丛生的陌生词语纷至沓来，以致有学者惊呼“乱花渐欲迷人眼”。在“引进来”的同时，通过留学访学、国际研讨等多种途径，我国学者也在努力走入国际学术前沿。

1.4.1 走向国际

20 世纪下半叶，我国“很多学者都在致力于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西方译论的引介移植或新理论的创立构建工作，有关‘中国翻译理论落后于西方’‘当前翻译理论脱离翻译实践’等的理论批评也不绝于耳”（蓝红军 2015：16）。新世纪我国开启了翻译学科建设的航程，高校开设翻译专业，创立翻译硕士点。我国学者探赜索隐、潜势突发，翻译研究论文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在上述五份国际翻译期刊 2004—2014 年所发的 628 篇论文（见表 1.1）中，中国学者发表了 96.25 篇

(因与国外学者联名发表,统计中产生小数点),占15.3%,仅次于西班牙,排名跃升至世界第二。根据王立松、张旭姣(2022:545)的统计,2005—2021年间,14种国际译学权威期刊的发文总量为5,026篇,其中中国学者贡献606篇,占比达12.06%,位列世界第二。如今,中国学者的成果在国际学刊上屡见不鲜,个别学刊甚至呈高发态势,如在*Babel*和*Perspectives*发文总量中,中国学者发文占比分别高达30.17%和25.88%。2014年之前,我国学者在国际顶级翻译学术期刊如*Target*上发文很少,现有逐年递增之势。

1.4.2 渐入主流

中国学者开始走向国际译学前沿。王宁作为*Perspectives*的联合主编,先后三次编辑中国翻译思想研究专辑,其间有20余篇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发表。许钧和王克非主编的*Meta*1999年第1期《中国翻译研究专号》(*Théorie et pratique de la traduction en Chine*)用英语、法语出版,我国10余位著名学者向世界介绍了国内翻译研究各领域的成果。在国际译坛上,罗进德、李运兴、林茂荪、黄友义、许钧、王宁、罗选民、黎翠珍、张佩瑶、孙艺风、张美芳等一批学者声名鹊起,分别被聘为不同国际刊物的编委或顾问,林茂荪、黄友义、高岸明等先后担任国际译联理事或副主席。综上,无论从国际学刊的发文量,还是国际学术活动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来看,我国已开始进入国际主流阵地,在国际译学界发挥作用日益明显。

1.4.3 自主创新

历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理论引进后,我国译界赶上了现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步伐,对译学本体和外围有了明晰的认识。这一时期,“西方的翻译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及其话语系统渐渐进入国内学人的字里行间,西学方法的分析性、逻辑性、思辨性特征得以张扬”(方梦之2017:93)。但“接轨”不是目的,在国际译学的轨道上前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才是目的。我国对翻译的系统研究一开始就面临着吸收借鉴与本土自我之间的张力。中国翻译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存在于本土社会,翻译研究的对象、目标和需要在本土社会,根源